J 焦点网谈

广东官员建议规定农民工进珠三角须高中毕业

新闻：在7月13日举行的广东省政府参事决策咨询会上，省政府参事曾添贵建议，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必须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7月15日《南方都市报》)**

建议虽好但很难实现，用工单位会首先反对。老板们都想价廉物美，要尽量压榨员工工资，多赚点钱。

——广东网友

他应该建议，进入广东要考托福和GRE！

——网易网友

我国现在只实行9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的人就没有就业权力吗？他们也要生存啊！

——搜狐网友

不是说好先富裕带动后来者，达到共同富裕吗？怎么这么快就忘了兄弟啦？

——南海网友

山东烟台前官员在森林公园建祖坟

新闻：近日，网上有人举报称，山东烟台市人大常委会原常委、海德集团董事长李德海，在国家级森林公园昆嵛山中，耗资数百万元，为其母及前妻修坟。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委宣传部称，举报者所反映情况并非实情，修建的坟墓为烈士纪念馆。记者调查发现，李母和李妻并非烈士。**(7月15日《新京报》)**

官员毁林建豪华坟地实在影响恶劣，政府应该顾及自己的形象。

——人民网友

当地纪委、园林管理部门不知道吗？不知道是失职，知道不管是渎职！

——新华网友

真厉害！几百年以后中国又多了一批文物！

——山东网友

烈士纪念馆能修成这种封建样式的吗？太可悲！

——南海网友

T 头条评论

拒绝被权力与商业引领的纪念

□ 单士兵

文化老人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是同在7月11日这天辞世的。这一天，甚至被一些人视为中国学术界的哀悼日。从那一刻掀起哀悼悲情，这些天如水一样漫溢过几乎所有的媒介。只是，悼念季羡林势如潮涌，缅怀任继愈先生则清淡如水。

季羡林先生能拥有身后如此哀荣，我也以为，这是对其学术成就与人格魅力的一种界定。只是，相较之下，任继愈先生的辞世，太过寂寞了。我在这种寂寞之中，也碰触到中国文化中一种刺痛人心的东西。

除了读过季羡林诸如《牛棚杂忆》、《病榻杂记》之类的散文，我对其学术成就可以说不甚了解。这让我觉得，对季羡林的辞世实在难以致深切的吊慰之忱，毕竟，对于纪念来说，还是要讲究“非诚勿扰”，否则，那些悼念与缅怀的文字，必然太过矫饰，那也将是对逝者的一种不敬。于是，连日来，我选择在别人悲情的文字寻迹季羡林老人的生前伟岸。

看得多了，也就知道季羡林先生最伟大的成就，断然不是我以前看过的那些散文，而体现在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梵文、印度历史与文化等领域的不凡建树。事实上，媒体在罗列季羡林先生的身份时，也多是强调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等等。于是，我彻底明白，季羡林先生所研究的专业，是地道的“冷门”。

只是，研究“冷门”季羡林先生是深受媒体关注的红人，生前如此，逝后犹甚。而与季羡林同日辞世的任继愈，研究的也是“冷门”，不同的是，生前寂寞，死后淡然。媒体关注程度的天壤之别，令我不禁在想，难道这样的落差，真的就是二者在学术成就与贡献方面的表征吗？不是的，事实上，不仅毛泽东曾赞誉任继愈先生“凤毛麟角”，当今学术界也都普遍给予任继愈极高评价。

更重要的是，许多媒介在祭奠季羡林先生的时候，还不惜搬出那顶早被季羡林拒绝的“国学大师”的帽子。也就是说，对季羡林先生的热烈关注，也根本不是基于其“冷门”学术成就本身。种种纪念季羡林的影像与文章，更像是权力引领下的一种纪念运动，更像是文化消费主义的一种商品制造，贴在一些学术界、文化界人士的脸上，或是挂在这些人开设的商铺中，作为一种卖点、标榜、显扬。在我看来，这或许是连逝者哀荣也难以承受之重。这样的情境，倒让我多少觉得，任继愈先生在逝后的寂寞，或许也是一种幸福。

一切都在表明，在许多人的视界，在所谓的大师与学者之间，根本就没有一条清晰的界线。现在尽管他们对那些“冷门”的学科毫不了解，却底气十足地喊出诸如“季羡林之后，再无大师”、“季羡林辞世是大师时代的终结”。在此，我当然绝无意于否定季羡林先生堪称大师，只是真切地感觉到，一个茫然追逐大师的时代，也就会是一个随意否定大师的年代。任继愈先生身后在媒体关注上遭遇了寂寞，其实就是明证。

悼念季羡林的热烈与缅怀任继愈的清冷，让我确信，真正的大师绝不应是为了让权力成为粉丝，也不应是被用来作为追逐商业盈利的工具。

官员酒事越多，法治社会越艰巨

□ 燕 农

日前，武汉市新洲区水务局47岁的副局长金国庆在陪客吃饭过程中，因饮酒过量导致心脏病突发死亡。当地纪检监察部门表示，2005年发布了“禁酒令”，今年的工作重点是查处公务接待，金国庆饮酒过量身亡一事是否涉及公款消费以及哪些公务人员参与饮酒等问题，纪检部门已启动程序介入调查。**(7月15日《齐鲁晚报》)**

纵然有“禁酒令”在先，一个生命因吃饭喝酒猝然而止，依然令人惋惜。如果是公款消费尤其是没有名目的公款吃喝，金国庆估计很难能够得到社会的同情；即便是参加私人宴请，因为有“禁酒令”在先，也很难得到体制内认同——一切仿佛都是死者的个人问题，而笔者所关注的，恰恰是官员酒事与社会秩序的问题。

政府官员饮酒滋事，譬如斗殴、狂言、猥亵女性、驾车撞人、直至饮酒身亡，是经常见诸报端的新闻，以至于民众有些见怪不怪了。从一些地方颁布的“禁酒令”和喝酒指标的红头文件看，在一些地方“酒场”仿佛占据了“官场”的重要分量。这其中，如果一些地方官员公款消费大吃大喝，那么注定与官员腐败存在千丝万缕的干系。众所周知，腐败不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而是双向度和多向度的问题，那么，既然有官员吃拿卡要和把酒问事，所对应的关照提携和权“X”交易几乎无可避免。所以，说官员的酒场能够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实不为过。

而抛开酒桌上的腐败不谈，单说一些官员应接不暇的酒场，或许也是法治社会的绊脚石。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通过私人关系构成一张张关系网；只有社会变迁为“陌生人社会”，其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但是，看看一些地方“禁酒令”都禁不住的官员酒局，很难说我们在向“陌生人社会”迈进。事实上，一些官员的酒场已经成了“关系网”笼罩下的“关系场”，或者是通过酒局的“关系场”在编织“关系网”。于是，在一些地方的公权范围内，几乎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的事，“熟人社会”得以生动描摹。

官员酒场上的“熟人社会”，显然对法治社会的构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公权层面“潜规则”多了，法制层面的明规则就要被异化。当一些权贵群体越来越熟稔于“熟人”状态，底层民众越来越无奈于“陌生人”状态，法治社会的构建将变得异常艰巨。而这，有多少是官员“酒场+关系场”所累积的结果，我们充满想像而又无法想像。是故，整肃吏治，构建法治社会，也需要从官员的酒桌着手。

受贿近2亿为何还只判死缓？

□ 张贵峰

15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陈同海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审理查明：1999至2007年6月，陈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7月15日人民网)**

“1.9573亿，还不够死刑?!”这是许多网友对这一判决的质疑，也是笔者的疑惑。对此，法院的解释是：“陈同海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陈同海在因其他违纪问题被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上述全部受贿事实，具有自首法定从轻处罚情节；此外，陈同海还具有认罪悔罪，检举他人违法违纪线索，以及积极退缴全部赃款等酌情从宽处罚情节，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不得不承认，上述解释中，虽“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因而最终仅处以死缓等语，已日渐成为一种相当固定的、针对贪官尤其是针对像陈同海这类省部级贪官的判决模式、套路、惯例。但即便如此，陈同海受贿近两亿仍被死缓、免于一死的判决，仍让人备感不解。——受贿、贪了几百万，死缓也就罢了，可近两亿“量级”的贪赃枉法，何以还要套用“鉴于……”而死缓？如此一来，贪多少够死刑的边界、界限，究竟在哪里——还有没有一个可供人们预期、判断的“准谱”？要知道，我国《刑法》的规定可是：“贪污或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这也就是说，“1.9573亿”差不多几乎整整2000个“10万以上”，同时也是郑筱萸受贿金额的30多倍，如此的恶劣情节下，岂能依旧继续“鉴于……”？更不用说，同样是经济犯罪，在民间、在社会底层，曾经仅仅恶意取款17.5万的许霆，一审便被判处无期徒刑；而捡拾300多万金饰的“女许霆”，同样可能面临无期的刑罚。——那么，此不“鉴于……”，彼何“鉴于……”？

不难想象，陈同海的1.9573亿赃款(足以购买2万多吨当前的高价成品油)的最终买单者、来源，除了广大成品油消费者和他们的腰包外，还会有什么别的途径？所以，即便不从司法，而仅从经济的角度——警戒垄断者、制约垄断行为，保护消费权益、避免其社会危害层面来看，严惩而不是从宽对待陈同海之类腐败国企高管，也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恋爱诚信”是新版“乱点鸳鸯谱”

□ 武 洁

西南大学日前在国内首次亮相古诗体《大学生诚信守则》和全新的大学生诚信网络考核系统，大学生在校恋爱“是否存在欺骗他人感情”的情况都将作为是否诚信的评判因素之一，计入系统接受统一评分。**(7月15日《重庆晨报》)**

“欺骗他人感情”当然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假如负心汉陈世美入读西南大学的话，一定会被诚信记录照出原型，连就业求职恐怕都要受到牵连。

不过，陈世美同学难逃恋爱诚信记录的惩罚，恐怕并不能成为恋爱诚信记录无可指责的理由。事实上，感情从来都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很多时候，甚至连恋爱中的人自己都很难准确把握，恋爱的分分合合更是正常现象，并没有严格的是非对错之分。既然如此，所谓的“欺骗他人感情”究竟该如何定义，其实本身就是个不确定的议题。假如简单地认定恋爱分手的主动一方便是“陈世美”，被动一方便是受害者的话，更是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并无二致。照此逻辑，大学生恋人们迫于恋爱诚信评分恐怕也得“从一而终”，即便要分手也得忍到毕业后。如此“恋爱诚信”，倒是更像新版“乱点鸳鸯谱”。

此外，恋爱属于个人隐私，即便是建立大学生诚信记录，把鼻子伸到大学生个人隐私之中，恐怕也并不天经地义。再说了，这么多大学生的恋爱和情感，恐怕也不是大学想记录便能记录的。

●/新书浏览

《辉煌60年：共和国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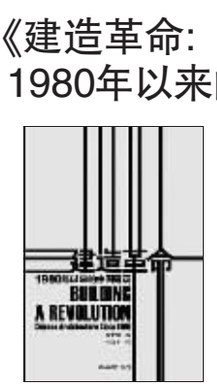
作者：林钊
新华出版社
2009年6月

历史是继续前进的基础，也是开创未来的启示。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权威专家学者撷取共和国风雨历程的珍贵印记呈现给读者。

在开创与跨越篇章里，有新纪元的拓荒，有恢复国民经济元气的艰辛，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苦斗，有百折千回的曲折，所化作的大国智慧，在破冰与扬帆篇章里，有30年前吹响的改革开放号角。有令人眩目的探索和突破，有清晰的执政方略，有世界震撼的成就，化作现实的大国之路；在登高望远篇章里，有信息时代的大国策略，有应对挑战的抉择，有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的行动纲领。

本书把宏大叙事、平实的语言风格和珍贵的历史资料有机结合，多层次、全方位解读了历史的细节和共和国的波澜壮阔，是为党政领导干部提供的具有吸引力、穿透力的形象直观了解共和国历史的最佳力作。

《建造革命：1980年以来的中国建筑》



薛求理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图文并茂、条理清晰地介绍了自1980年以来中国建筑的革命性变化，包括民族特征的演变和海外建筑思潮对中国的影响。通过建筑师的思考和作品充分展示了作者细致的观察和系统的整理。阅读该书，读者可以体验到全球化和现代化对中国建筑的深刻影响。

该书英文版自2006年面世，在海外广受赞誉。现中文版添加了近几年的新落成建筑，以及海外建筑师在中国的最新建筑作品图片，丰富了我国建筑发展的观念和视角。

●/新作点评、书摘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9年第7期隆重推出李鸣生报告文学力作：

《飞越人间——中国载人航天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令世界瞩目、让国人骄傲的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工程，对于常人来说，无疑充满了神秘色彩。在它的背后，有着无数惊人内幕和众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七号，从准备点火到安全返回，每一步都事关生死成败，必须保证万无一失。每临发射，上动中央领导，下系普通工作人员，牵一发而动全身，悬念不断，步步惊人。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以大量翔实珍贵的材料，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辉煌历程和航天人的生动足迹，其中披露的大量内幕，必将带给您新鲜的阅读体验，让您叹为观止！

《飞越人间》书摘：

西伯利亚的寒流是在一夜之间到来的。寒流先是横扫欧洲，而后越过天山东部山口，一路滚滚而来。寒流到来的直接结果是，发射场的人们翌日清晨刚一睁眼，便发现纷纷扬扬的大雪已经覆盖整个发射场了！

这一天是2002年12月21日，离“神舟四号”的预计发射时间还有八天。很快，酒泉基地气象室通过对30多年来的气象资料的详尽查阅、分析，作出预报：此次寒流来势凶猛，为戈壁滩上30年来所罕见，届时将会给发射场带来一场强降雪，造成超低温天气，最低气温很可能接近-30℃！

果然，漫天的大雪整整持续了两天两夜，发射场最低气温很快降至-30℃！冷，的确很冷！而忙于火箭、飞船的航天人更冷！但这冷不是冷在身上，而是冷在心里，尤其是发射指挥部的几个头头们！

最“冷”的恐怕要数基地司令员张建启。基地上次不小心撞了火箭，差点惹出惊天大祸。这次不知为什么，又惹老天爷翻了脸。作为发射场的负责人，张建启当然紧张。他马上让基地气象人员对发射场区近40年的气象资料进行分析统计，看近40年来发射场每年冬季出现低温是在什么时候，最低气温低到什么程度，每次“发射窗口”的低温又是多少。结果发现，往年这个时候发射场的气温不过就是零下七八度，40年中的最低气温也从未超过-18℃！如果“神舟四号”发射日定在12月29日，届时发射场的最低气温将是-24℃，“发射窗口”的气温是-25.5℃！

在寒流袭击戈壁滩发射场的同时，位于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大草原的飞船主着陆场同样是风雪交加，黄沙漫漫，气温也降至-30℃！入冬以来连降几场

大雪，加上此次滚滚寒流的突然入侵，绿色的草原变成了白色的雪原。许多在外执勤的科技人员鼻子耳朵冻得失去了知觉。就连一些大型设备，用航天人的话来说，也被冻得“呆头呆脑，反应迟钝”了。有一台仪器不能正常工作，科技人员竟用电磁煲给它保暖！

怎么办？前三次发射，问题不在火箭上就在飞船上。可这次问题既不在火箭上也不在飞船上，而在天气上！低温，成了整个发射区关注的一大焦点。指挥部当即召开紧急会议。总指挥李继耐头天晚上一夜没睡，他连夜查阅了世界各国有关低温条件下发射的资料，并作了一个统计。所以，会议一开始他便宣布了一个数据：在全世界的航天发射中，有10%左右的事故都是由低温引起的！并举了美国“挑战者号”爆炸的例子。他告诫专家们对大自然要充满敬畏之心，一定要居安思危，引以为戒，高度重视这次发射中的低温问题，加强火箭、飞船的保温工作。

会后，发射场迅速展开一系列保温工作。此时火箭飞船已转运至发射场，飞船燃料也已加注完毕，如果气象条件允许，29日凌晨将实施发射。于是，为了给火箭保温，发射场专门成立了临时“火箭飞船抗寒抢险小组”。

(摘自第四章《棉被盖在火箭上》)

●/书评·社科精选

《废墟上的觉醒》：非常态中的意义重建

■ 丁晓原

言说中国地震文学，我们已习惯于将钱钢的长篇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作为一种标志性的存在，以至于现在评估四川汶川地震文学的价值，也总是要把它推出以作参照，所给出的基本判断是目前尚无超越《唐山大地震》的作品。对这样的结论当然需要作进一步的论证，但我感兴趣的并不在此。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出版于1986年，是在地震发生后的十年。这样的状况个中自有值得思味之处。汶川地震中，作家，主要是报告文学作家差不多是在第一时间进入现场采写，这种集体出场本身所体现出的职业精神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同时，在前所未有的全媒体开放的报道竞势中，《生命第一》(何建明)、《晋人援蜀记》(赵瑜等)、《震中在人心》(李鸣生)、《震不垮的川娃子》(孙晶岩)、《天堂上的云朵》(朱玉) 等大量地震报告文学写作现象。这种规模化的写作集结，可以说在报告文学史上创造了一个记录。这就是我认知的汶川地震文学不同于唐山地震文学所具有的一些特殊意义。

陈歆耕的《废墟上的觉醒——关于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的问卷调查》，则在地震文学中又是别有独特意义的作品。作为《解放军报》记者出身的作者，当然有着战士突入前沿的意识，但《文学报》主编的岗位使他不能随心而为。在陈歆耕这里对于汶川地震记写的缺席，可能意味着作为一个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对于职业精神的放弃。这是他所不愿意的。正是这种内化了的职业精神使得陈歆耕欲罢而不能，并且时时激活着他的写作姿态，一旦有了一种富有意义的可能，作者便会行进在写作的路上。《废墟上的觉醒》在地震文学中的独特，可以显见的是叙写的对象和采写的方式。虽然作者自身无法抵达原初的现场，但借助于志愿者自叙所思所见所感所忆的电子文本，可以超越直接采访而存在的时空限制，获得足以支撑写作展开的关于对象的具体而有信度的质料，使《废墟上的觉醒》更多地达成了作为非虚构作品应有的实录品格。

《废墟上的觉醒》在我看来，其更为重要的独特是内含于地震志愿者书写之中的主旨表达。我们现在生活的常态中，物质中心主义销蚀着人性的种种美好，心灵的物

《废墟上的觉醒》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化令有识者担忧。地震作为一种非常之态对人类的精神存在作了一次当量极大的破坏性测试。陈歆耕正是从这一维度观察并思考汶川地震中的人。但他并不是一般地从人性的角度来考量透视，而是通过对成人，作为公民他们在地震中的行为模式及其价值取向的摄照、分析，告诉读者人性存在的基本面。应该说作为公民的样本，志愿者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百数十万的抗震志愿者，正如作者所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奔赴灾区完全是个人自觉、自愿，且后果自负的行动”，而惟其此，初始非组织行为的个体志愿者，在最大程度上，最为本质、最为真实地反映了地震非常时期人性以及人的精神取向。在陈歆耕看来，志愿者“他们的行动所表现出的大爱之心，同情和悲悯意识，是市场经济条件和环境下人性善美的重要觉醒和复苏。他们的行动所体现出的精神文化价值，超越了他们在抗灾中发挥的效能。这是地震馈赠给中华民族的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如此，作者还由此独到地发现：“在这场灾难中，大批志愿者的涌现，是中国社会公民意识得到强化的重要表现。”而公民意识的核心是公共责任和公共精神，这构成了国民的基本道德价值。可以说，正是由于这样的发现和认知，使《废墟上的觉醒》的立意不惟富有新意，而且达至人所未及的深度。

当然作为一部非虚构的叙事作品，其主题价值主要不是通过作者基于理性思辨而得的精要表述实现的，而是由其中人物的全部表现给呈示的。近30万字的作品分为四章，第二章“心灵的‘震波’”和第三章“汗水·泪水·血水”构成全书的主要内容。穿插作品其间，构成作品基本段落的是林林总总朴实而感人的志愿者故事，其中有为富而大仁的民营企业家，有秉持“唐山精神”的唐山下岗女工，有“老兵”，有写了“遗嘱”的女作家，有“因为我是党员”的志愿者等等，几十个面目不同，方式不同，故事不同的人物，却有着共同的名字，怀有人类的大爱和公民的职志。读着他们的故事，为他们感动、感染、感奋，人性或公民道德会得到洗礼、升华，情不自禁处，潸然泪下，升腾起一种崇高的力量。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普通并且自己也有困难或创伤却拥有高尚灵魂的人，如“‘死亡赔偿金’与一座图书馆”一节所写的刘桂芳。刘桂芳不是把志愿者工作作为临时性的对受灾者的援助，而是把它“当做了自己毕生的事业和生命的全部寄托”。她先把8万元钱分发给最需要帮助的灾民，然后又从银行取出30万元为灾区孩子建图书馆。这是一笔特殊的钱，是刘桂芳男友用生命换来的赔偿金。38岁的刘桂芳与爱相守，而当灾区孩子需要时她能慨然捐出，这是怎样的一种大爱？在刘桂芳身上荟萃着人性的至美和公民的大德。《废墟上的觉醒》正是以这样的叙写，让我们感受到非常态中志愿者的特殊意义。在我看来，这或许不是觉醒，而应该是一种证明，人性本有的美好在非常时期得以烛照。这便是我们国家民族伟力之所在，希望之所在。

(作者丁晓原，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